

贺昌盛/著

“性”想象的空间

汉语情色文本的知识学研究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012221005)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性”想象的空间

——汉语情色文本的知识学研究

贺昌盛/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性”想象的空间：汉语情色文本的知识学研究 /
贺昌盛著.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457-0997-1

I. ①性… II. ①贺…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 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5164号

“性”想象的空间：汉语情色文本的知识学研究

著 者：贺昌盛

责任编辑：薛勇强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sj@sxpmg.com

网 址：<http://www.sjcbbs.cn>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14年12月 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0997-1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贺昌盛是一个十分勤勉的年轻学者,在整个博士后阶段,他几乎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娱乐时间,一心扑在钻研学问上。加之他有着较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良好的文化素养,以及对文学作品独到的敏悟能力,所以,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就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同时,他还参加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的部分写作;而这部书稿也是他两年多来的呕心沥血之作。凡此种种,足见昌盛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事业的痴迷。

昌盛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重镇武汉大学博士毕业,且师从学术严谨、学养深厚的易竹贤教授,可谓打下了文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我发现,他不仅具备那种对文学的诗性体悟能力,同时又兼有对事物的哲思善辨能力,是一个融感性与理性为一身的学者。因此,在他的文章中,我们既可以充分地享受到诗意的审美体验;同时又可以在滔滔不绝的慷慨论证中体味到酣畅淋漓的思辨快乐。这个博士后出站报告就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一行文风格。

作为对现代中国情色叙述的论证,作者所要追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点作者在“导论”里说得很清楚:“‘性’的问题不只限于‘性爱’的具体活动,它更包涵着由这一活动所引起的人的心理乃至整体精神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个体生命及其社会存在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等等。讨论汉语文学中的‘情色’文本,事实上也可以理解为从‘性’这一既敏感而又处于核心位置的问题出发,来透视中国的‘人性’观念的细微变化。考察‘情色’叙事,

不只是一要追问‘它说出了什么’或‘它是如何说的’，更要追问‘这样说意味着什么’。”（见本书“导论”）

无可置疑，人性的折射在文学中得以最大值的表现，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作为人性中重要构成的“性爱”往往被我们的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虽然近十几年来已经有些学者作出过努力，也有一些成果问世，然而，将 20 世纪文学中的典范文本放在一个富有哲学意义的“情色叙事”的整体框架中去进行史的梳理，并且将其从形而下的感官描述中上升到形而上的理性认知与文化批判上，这可能是其他学者尚未顾及和企及的论域。就此而言，我以为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情色叙事”史论研究的不足。

作为文学研究的“情色叙事”论述，作者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对它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这种界定所遇到的麻烦不仅是与交叉学科的学术区分，还得与古今中外的“性学”理论和概念进行比较与修正，以便最终确立论者自身所阐定的“情色叙事”理论内涵与外延。由此而进行旁征博引的史论分析，我们便看到在纲举目张下的论述者那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论证效果了，尤其是作者运用图表方式来表达那种难以倾诉的灰色理论概念，充分展示了论者明晰的逻辑思路和举重若轻的表达方法的直观效果。

我往往在想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做学问的兴趣在哪里？我想，出发点的不同，就决定了其到达的终点的不同。我主张做“活学问”，而非那种仅仅是在不断增加知识积累，而不能为后人与后世提供新的思想与学识的“死学问”。现代学者应该首先是思想制造者，应该像蚕那样去“吐丝”，像西西弗斯那样去滚石。一切研究的愉悦就在于“过程”之中！贺昌盛就是本着这一宗旨来支撑着自己学术研究的一片蓝天的，他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结论’也许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过程’，即，‘情色’叙事正在成为我们‘思想’的对象，它有着一种什么样的面貌以及何以会有这样的面貌等等，‘知识/观念’组合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必须以‘言说’的

方式将它们‘说’出来,这就是唯一的目的。”(见本书“导论”)唯有此,做学问才能进入一个“自由的王国”,成为一个脱离庸俗呆板学术氛围的学人。

昌盛还很年轻,其学术道路也很漫长,我以为,只要他有永不懈怠的毅力,相信他会有所建树的。

是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a stylized character followed by the characters '帆' (Fān) and '帆' (Fān).

2004年9月17日于紫金山下

目 录

序	(1)
导 论	(1)
 第一章 古典情色叙事的历史形态与想象形态	(13)
第一节 “性”的规诫及其历史	(13)
一、“性”自由与“性”禁忌	(13)
二、“准科学”文本：“房中术”	(20)
三、情色话语的载体：妓女、娈童及其他	(23)
第二节 以“文学”方式展开的“性”解释	(29)
一、性的“故事”：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情色想象	(29)
二、性的“规诫”与“情色小说”的泛滥	(43)
三、“狭邪叙事”与“鸳蝴小说”： 清末民初通俗文艺的歧路	(60)
 第二章 “五四”个性解放的先声——“性”的启蒙	(68)
第一节 “问题”时代的“情色”话语	(68)
一、对于“性”角色的重新确认	(68)
二、“贞操”问题先行于其他问题	(77)
第二节 “性”的苦闷	(85)

一、郁达夫的立场及其《沉沦》系列	(85)
二、女性作家的暧昧态度	(91)
三、过渡时代的“性”误差： 其他男性作家及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创作	(96)
第三节 “性”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	(110)
一、从“灵肉一致”到“精神升华”： 周作人眼中的“性”	(110)
二、“没有爱”与“无所可爱”的悲哀：鲁迅的困境	(119)
第三章 游弋于“灵”、“肉”之间的情色诉求	(134)
第一节 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引入	(134)
第二节 “肉身的感觉”：“新感觉派”的艺术尝试	(143)
一、都市背景中的情色消费：刘呐鸥	(143)
二、漂浮于都市的“情色”游戏：穆时英	(148)
三、性心理分析的自觉实践：施蛰存	(152)
第三节 “性”的自然形态：沈从文与湘西世界	(160)
第四章 政治背景中“性”的在场与“情色”叙事的缺席	(170)
第一节 “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	(170)
第二节 在“革命”话语的夹缝里： 丁玲与《我在霞村的时候》	(174)
第三节 村落里的“性事”：赵树理的态度	(180)
第五章 被重新“启蒙”的“性”话语	(186)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灵魂历险： 张贤亮及其“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188)
第二节 俗世民众的“情色”焦虑：王安忆的“三恋”及其他	(203)
第三节 现实生存中的历史剪影：古华的《贞女》	(217)

第六章 “开放”的“性”世界	(222)
第一节 “纯情即痞性”:商业背景中的王朔小说	(222)
第二节 暴力·情色·革命	(230)
一、“情色”与暴力	(230)
二、自由人性与人文关怀:王小波的理性视野	(234)
三、“情色/革命”话语的异形同构: 阎连科的《坚硬如水》	(241)
第三节 缺失的个体:陈染、林白的“私人叙事”	(250)
第四节 文化视野中的情色叙事	(256)
一、乡土中国的宗法结构:《白鹿原》个案	(256)
二、精神圣火的熄灭:《废都》个案	(264)
三、“这就是我的身体”:世纪之交的“文化事件”	(271)
主要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83)

导 论

作为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如同饮食、衣装一样,“性”本不应该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但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围绕着“性”所展开的争论不仅从未断绝,还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人类在进入“现代”世界以后,有关“性”的问题的讨论几乎已经成了人类生存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焦点。从一般学科的角度来说,以“性(Sex)”为核心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诸多各自不同的专门领域,比如性社会学、性文化学、性心理学,以及性医学等等,这里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以“性爱”想象为主的文学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或者称之为“情色”文学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情色(Erotica)”一词与“色情(Pornography)”是有明显区别的,“情色”文本虽涉及对“性爱”活动多重层面的描述,但它所突出的是性爱和欲望所激发的人的感觉体验及其内在的精神性蕴涵,所以,其对“性爱”活动的描述只是窥探精神现象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像纯粹的“色情”文本那样以“性爱”活动的挑逗和刺激作为最终的唯一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性”的问题为平台的研究,既是为了清理有关“性”的观念的基本构成,同时也是在展示“性”的背后所隐含的“人”的精神演化的历程。“性”问题的研究所针对的主要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众多的“情色”文本,其中以想象性的文学文本居多。无论这类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引起过何种的争议,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我们都必须承认,它们所开拓的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想象空间,其中所蕴藏的正是“人”自身精神深处的隐秘信息。

汉语文学中的“情色”文本,其数量和形态都是极为丰富的,但由于汉文化自身的某种特殊的限制,这类文本从来都被排斥在正统的主流文化之外;

即使是在进入了现代社会以后,全新形态的现代中国文学中,“性”的话题依旧隐含着其特定的“禁忌”。遮蔽有关“性”的问题的讨论,既遮蔽了中国文化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观念”建构,同时更是在掩饰汉民族自身的精神在“异端/非主流”向度上屡有诉求的事实。所以,严肃认真地重新梳理从古至今汉语文学中“情色”文本的演变轨迹、“叙事”特征及其内在的意味,既是在描画“性”的问题在汉民族文化中的观念构架,更是在从一种被视为“另类”的角度来描述汉民族自身独特的精神演化史。

出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民族特性,汉语形态的“情色”文本有其区别于西方同类文本的特点,而产生于现代这类文本,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本的影响而具有了明显的现代质素,但是否就可以肯定它们已经完全割断了其与中国传统伦理规范下的话语形态的联系,却是个还有待于进一步辨析的问题。“性”的问题不只限于“性爱”的具体活动,它更包含着由这一活动所引起的人的心理乃至整体精神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个体生命及其社会存在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等等。讨论汉语文学中的“情色”文本,事实上也可以理解为从“性”这一既敏感而又处于核心位置的问题出发,来透视中国的“人性”观念的细微变化。考察“情色”叙事,不只是为了追问“它说出了什么”或“它是如何说的”,更要追问“这样说意味着什么”。

表面上看,现代形态的“情色”叙事似乎仍在以其特殊的话语方式抗拒和反叛着某种“性的压抑”及对“性言说”的规制——这一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文学与礼教传统及其“性禁忌”之间的持续对抗。但事实上,它所展示的丰富图景远不是这种简单的静态对抗关系所能够概括得了的。“情色”叙事的背后实际正隐含着叙事者对于“人性解放”问题的多重探索。并且同时,随着这种探索的不断深入,一种新的“情色话语”通过一系列法则已经被重新组织起来了。依照福柯的观点,它们已形成了新的“权力话语(规范)”,并逐步展开了其新的规诫与限制。正像监狱的改善并非表明文明的进步,而只是说明权力的统治更为高明也更为隐蔽一样,“情色”言说的日趋公共化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人的全面解放”。“情色话语权力”既生产知识也生产着实践,这就给批评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任何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将带来某

种灾难性的后果。探究“情色”叙事的历史,就是为了掘索出隐藏在这类话语背后的那些起着支配作用的“知识”与“观念”,从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回头看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上所留下的那些可能被忽视的痕迹。

“情色”叙事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它同时又是一个批评与创作均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习惯于以一般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文学中的“情色”叙事,即首先确定它是否符合当时的或者人们习于遵从的既有道德规范,然后再确定是否应当容忍或者否弃这类叙事。这种批评惯例很容易使那些超出了某种道德规范的“情色”叙事立即被打入“冷宫”,从而成为“言说”的“禁忌”。人们固然能够以这种方式来维护社会群体所必要的秩序,但在另一方面却无疑极大地限制了文学叙事的自由——一个从表面上看来一切都显得尽善尽美的社会其实是一个真正可怕的社会,因为它正在以它的所谓合理的秩序来掩盖在它看来应当被划归“丑陋”之列的那些东西,而它们之被掩盖实际上却并不表明它们就不存在——这恰恰证明了这个社会对于公众的更为高明的欺骗。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文学中的“情色”描写有过各式不同的评价,但这些评价基本上是立足于“社会-伦理”层面的批评,有着浓厚的道德价值判断的色彩。从文学本位来看,“情色”叙事在汉语文学中是如何实现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它具体经历了怎样的演进;这一叙事活动中隐藏着怎样的话语结构;“情色”叙事在文学批评中到底应该怎样定位;甚至于“情色”叙事背后到底隐含着怎样的特定文化意蕴等等问题,都远非单纯的“社会-伦理”批评所能解决的。

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情色”文本一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叙事的:一是对于“性爱技巧”的极端重视,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相当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性文本(“房中术”),其话语形态侧重于娱乐(嬉戏/快感);二是从道德伦理层面彻底否定前一种话语形态,并将其定位在“恶”的层次上,以此形成了“劝诫”模式的观念话语形态。当然,这一切都是以绝对的“男权中心话语”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两种话语范型常常共时性地存在于同一文本之中,因此造成了文本自身的无法弥合的裂缝——作家们的想象也

就往往是在这些裂缝的边界上向两端延展的。事实上,前一种话语形态所呈现的只是一种基本的事实判断(认知),而后一种话语形态所作出的则是某种价值判断(意向)。两种判断的对立在宋明以前尚不太明显,在宋明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则基本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叙事范型——即道德性的价值判断往往先行于事实判断——这正是汉语文学中的情色叙事始终无法获得一个明确定位的症结之所在。简单地将“性”的活动及其观念确定为“善”的或者是“恶”的,都将把“性”本身置于被遮蔽的状态,其结果就是,人们表面上是在讨论“性”的问题,而事实上“性”本身却始终处于“不在场”的状态。这就像一场受审者缺席的审判,我们只能听见法官的声音却无法听见受审者自身的合理申诉与辩解,这类审判即使合于法律的程序,但在事实上也只能被看作是无效的。

审视汉语形态的“情色”文本,另一种惯用的参照就是西方视角,特别是对现代中国文学来说,因为现代中国的性爱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逐步被确立起来的。应当承认,西方的性学理论及大量情色文学作品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巨大的,但这并不表明现代中国的“情色”叙事就理所应当成为了西方情色叙事的汉语翻版(尽管这种翻版现象也确实存在)。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曾有过三位性学思想家: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他们的思想对现代西方的“性爱”观念都曾产生过革命性的重大影响,但他们彼此的思想却又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性爱”历史实际上就是“性”的被压抑的历史,人的本能欲望(libido)与所谓“文明”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在他看来,“性爱”历史的演进即是一个从自由到压抑的过程,压抑是人类为了换取文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任由本能的欲望肆意迸发,社会及其文明就将彻底丧失并最终退回到其原始状态。由此,他才提出了将本能升华为艺术与思想以使其得到适度宣泄的主张。弗洛伊德的思想代表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之初的基本“情色”观念。马尔库塞则认为,人类其实完全能够拥有“非压抑性”的文明,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逻辑来推演,人类最终将拥有一个物质与精神均处于丰富和完善状态的社会形态,“性”的压抑只是人类尚处于匱

乏时期的特定产物,当人类的文明真正走向了成熟与完善,“性”的压抑也将得到真正的解放,“爱欲”也将重新获得其真正的自由。马尔库塞的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某种综合,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 20 世纪上半叶(或者说冷战时代)西方“情色”观念的代表。和以上两位思想家的思路截然不同,福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他既不认为人类真的存在过一种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性”的自由时期和压抑时期,同时也并不认为人类最终会获得一种如马尔库塞所强调的那种本能与文明的冲突被克服而带来的全新的自由爱欲。在福柯看来,所谓“规诫与禁忌”并不是某一阶层或某种统治所实施的压抑,“规诫与禁忌”的根源是来自于人类自我对自身“身体”的监视。这种监视由每一个个体自下而上地逐步扩散到不同的群体及其组织,比如学校、军队、监狱、医院直至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弥漫形成了一种“惩罚”性质的整体氛围,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人获得一个“被驯服的身体”(使“感性”的自由身体完全服从于“理性”)。至少在 20 世纪初期以前,西方“精神”的演化历史在整体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寻找并确立“理性”的历史,这种“理性”的最高规范即是“逻各斯(logos)”(也即“道”),“逻各斯”规范是一种必须被“言说”出来的东西,因此,这种规范被福柯称之为“话语(discours)”,而一切“权力(Power)”正是由“话语”生成出来的。所以,无论是“性压抑”还是“性自由”,都不过是“话语”的生成之物,它们都将被放置在“话语权力”的监督之下(比如性的“医学话语”对于性行为的监督)。现代的西方人已不可能再像古代希腊时代那样从性快感本身去体验什么是“快乐”了,而只能在忏悔中寻找那种“由分析而得来的”快感;性活动问题的焦点也已不再是快感以及享用快感的美学,而是欲望和净化欲望的解释学了,“性”也因此成了几乎可以解释一切的“知识”而失去了“性”本身。福柯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他揭示了人类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就是,不只是“性”,包括人类存在本身都只是一种“悖论”,人类只能生存于这种悖论之中。从西方性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正代表了现代西方“性爱”思想在不同阶段的演进历程,而他们的思想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我们目前观照汉语“情色”文本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

当我们真正将这些思想具体应用于我们的讨论和分析时却又会发现,汉语文学的情形实际上并不能直接与他们的思想形成对接,这也许正是造成了我们自身判断上的某种混乱的潜在原因。

严格地说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取向一直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表现在具体的“性爱”问题上,其差异也许就更大了。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式表述如下:



图 I 传统中国的性爱等级秩序 图 II 西方以性爱活动为起点的精神追问

以上图示只是为了区别中西情色文化的不同结构而设计的(实际的情形也许要更加复杂得多)。从上图可以大致看出,中国传统的情色文化主要显示为一种层次谨严的循环结构,任何一个层次都必须被纳入到整个大的系统之中才可能获得其意义,而各个层次之间又有着彼此互为因果的关系;每个层次内部(也仅仅只能在内部)可以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但整体系统本身却始终处于静止的(稳定)状态。相比之下,西方的情色文化则是一种不断上升的结构,本能欲望仅仅只是一种起点,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追问出“人”

乃至“世界”存在的最终极的依据来。在这一系统中,每个层次都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因为这种追问不是社会(或体制)强加给个体的某种责任与义务,而只跟每个“个体”有关——“我”只能追问“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何以是我而不是他”,或者“我”与这个世界及上帝之间有什么关系,而无法去追问“他者”的这些问题。所以,概括起来说,中西情色文化结构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差异:首先,西方人的性爱活动仅仅只是个体自己的事情而跟社会或体制基本无关,而中国人的性爱活动则可能牵扯到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由此,西方人力求从自身与其“对象”的性爱活动中相互观照来寻求自身与他者的差异(“求异”),以便确证自身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则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性爱活动保持在同他人基本没有区别的状态(“求同”),以免被视为“异类”而招来“他者”的谴责与排斥。其次,西方人从“求异”之中看见的是“自我”,而中国人从“求同”之中看见的则是“我们”。“自我”的独立意味着自身有着可以无限敞开的自由精神空间(精神的提升与堕落都将是自由的),而“我们”则意味着“个我”必须以牺牲自身为代价,来尽可能地维护和保证整体系统各方面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因为整体系统一旦遭遇破坏则自身也将随之失去存在的权利)。最后,中国文化的整体系统已经为精神诉求的最高范畴划定了边界(即“天道”),这就同时剥夺了每个个人自由地去开掘其精神空间的可能性(同时强化了其精神惯性与精神惰性),性爱活动也就可以完全与精神追求无关(也因此始终停留在初级层面的快感与嬉戏的状态,如对于“房中术”的痴迷)。西方文化的精神空间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性爱活动是人借以审视自身活动的核心内容,并且这一活动总是与孤独、痛苦、愉悦、惊喜、罪恶、纯洁、高贵甚至人格等等精神范畴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人对于这些范畴的深刻反思则正是精神活动本身的真正内涵。

明白了这一点,反过来看,中国古典形态的“情色”叙事在其本质上与西方传统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这也就意味着西方性学家们的思想只可能作为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参照,而不能是某种值得完全依赖的理论根据。

那么,中国在进入了现代社会以后,汉语的情色叙事形态是否就正式被纳入到了西方情色文化结构的系统之中了呢?答案是,未必如此。我们承认中国的“现代”形态是在西方的强力文化冲击之下建构起来的,但同时我们更需要承认,传统“文化”本身作为某种隐性结构在暗地里仍然起着核心的支撑作用。一个社会可以从体制上迅速完成从古典到现代的形态转换,但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具体的“人”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完成这种转换,因为既有的道德理念、价值取向及心理倾向等等精神蕴涵并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事实上,纵观现代中国的“情色”文本不难发现,其古典形态的“道德叙述”模式并未完全消逝,它仍然以一种隐在的方式潜存于文本之中,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现代性叙事的需要,其内涵有了某种相对的转换而已。“五四”时期,身体的愉悦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所压制,个体性的身体叙事被让渡给了整体的民族国家叙事(如郁达夫),所以,张资平人等的“情色”文本就被放置在邪恶的一端;意识形态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作为事实的身体叙事往往被认为是荒谬的(如丁玲),此时的身体叙事已被让渡给了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身体再次被让渡给了市场而成了可资交换的物态化商品,作家们以提供身体叙事为交换条件,将身体叙事转换成了商品生产的过程,进而使之被完整地纳入了经济流通的轨道。在整个现代“情色”叙事的历程中,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身体始终处于被放逐的地位,它甚至常常有着重新向古典叙事形态“逆行”的趋向(如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存在首先只能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当作为个体之依据的身体被彻底让渡给“他者”以后,人的存在就只能以缺席的方式出现了(即“非在”),身体是个体的人借以反观自身之“在”的必然的“中介”。这个“中介”一旦缺失,则所有的精神诉求都将有可能被架空(而成为虚构之物)。现代中国人表面上的“精神自足”其实和古人的“精神自在”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这种所谓的“精神”仅仅只是被“移植”在人的意识之中而不是真正从自我的“身体”里生成出来的东西。

除了上述中西情色文化上的差异以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即使在现代西方,其以性爱为根基的“人性”结构形态也在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这